

寻梦《临济录》：柳田圣山与禅语录

何燕生

柳田试图用历史学的眼光观察禅宗各个不同阶段发展、演变的历史及其特征,但他“重唐轻宋”,认为宋代禅是唐代禅的“异化”,不足可取。柳田的禅学研究,充满着鲜明的自我个性。而这种鲜明的个性,其实也反映在他关于《临济录》和临济义玄的研究上。

柳田圣山在日本的禅宗研究史中可谓一位划时代的人物。其著名的《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》(京都:法藏馆,1967年),第一次把禅宗研究从传统的重视“体验”的“护教式”研究中独立出来,开辟了相对客观的禅宗历史研究的新路径。对于以铃木大拙为首的重视“体验”的禅学研究路向,柳田常常示以“同情心的理解”,但他并不完全采纳。柳田向往以胡适为代表的“研究型”的近代历史学禅学研究,但作为临济宗的僧侣,他的笔下仍然流露着宗派上的偏好。柳田试图用历史学的眼光观察禅宗各个不同阶段发展、演变的历史及其特征,但他“重唐轻宋”,认为宋代禅是唐代禅的“异化”,是一种“体制化”了的禅,不足可取。柳田的禅学研究,充满着鲜明的自我个性。而这种鲜明的个性,其实也反映在他关于《临济录》和临济义玄的研究上。柳田先后出版6部关于《临济录》的专著,在柳田的禅宗文献学研究中,我们可以看到《临济录》被层层解构,被系谱化,甚或被“一分为二”,化约为“原来的”与“后来的”,甄别“真实的”与“虚构的”。至于临济义玄,柳田一方面反对把临济义玄视为一宗一派的祖师,主张应该把临济义玄从传统宗派观念中解放出来,作为一个“历史人物”来看待,还其本来面目,同时,在另一方面,柳田又对临济义玄充满着想象,并且将其人格进行理想化,甚至视为偶像式的存在。柳田同时对《临济录》中出现的“普化”这位符号性人物给予特别的关注,同一时期还对一休的《狂云集》进行研究,在柳田的笔下,临济、普化和一休,似乎构成了柳田版禅学叙事的一种符号——禅思想的“原型”。

柳田圣山关于《临济录》的诠释以及对临济义玄人物思想的“格义”,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先前的铃木大拙等人的相关研究的影响,但并不是“照着讲”,而是“接着讲”。柳田圣山关于《临济录》的诠释和对临济义玄人物思想的“格义”,充满着柳田本人的鲜

明的“问题意识”。

随着近年来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,我国学界对柳田圣山的禅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了解,而于柳田禅学背后所隐藏的“问题意识”的认识却不很充分。我想简单谈谈柳田禅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。

作为一种“圣典”的禅门语录

对禅宗稍有涉猎者,不难发现禅宗的语录和灯史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文献。记载禅宗发展与演变历史的文献,当然是那些被称之为传灯录的书籍,即禅宗的史书。然而,在严格意义上,这些史书并非完全记述了禅宗的史实,作为史书,其可信度便成了问题。同样,禅宗的一些语录,也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典籍和祖师语言,柳田称它们“充满着俗语和荒诞无稽之说”。柳田在对早期禅宗文献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之一,可以说是基于历史学、文献学的方法论,对中国初期禅宗的文献进行批判性研究,去伪存真,还禅史以本来面目。柳田的这种研究方法,对后来的禅宗研究影响极大,成为今天禅宗研究的最一般性方法。

柳田还将这种历史学、文献学的方法论应用到唐五代禅宗的研究中,特别是在关于禅宗语录的形成情况的研究方面,取得了惊人的成果。

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,即是发表于《东方学报》57卷(京都: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,1985年)的那篇《语录の历史——禅文献の成立史的研究》。该文洋洋30万言,因此,与其说是一篇论文,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专著更恰当。从内容看,该文是在此前出版的《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》的基础上写成的,因此,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,可以说是姊妹篇。

对于为何要重视“语录”的研究,柳田在论文中直接探讨



柳田圣山的《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》,第一次把禅宗研究从传统的重视“体验”的“护教式”研究中独立出来,开辟了相对客观的禅宗历史研究的新路径。

了禅宗特有的“语录”的形成过程。柳田认为,作为禅宗“语录”的特征,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著述,而在于它是关于“宗祖言说的听闻记录,是一种圣典”。他还指出,禅宗语录“一方面保持着圣典的权威,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低俗离奇的言词”,是“具有两种相互矛盾含义”的典籍。

柳田还考察了“语录”这一名称在禅宗历史上出现的年代。他指出,“在语录这一名称得到一般化之前,即自六祖惠能的徒孙之后,禅的第一手数据,或被称为语本,或被称为广语,或被称为语要,或被称为单地称为语。将它们集合起来,一方面编纂了通史,另一方面还编纂了语录全集,于是就诞生了通常称呼的语录”。柳田对“语录”形成过程的分析极其明快。

柳田的目的在于对“语录”在禅宗史上出现的经纬进行历史的考察。其中,他特别注意的是,在“语录”的形成过程中,《六祖坛经》拥有了作为真正含义的“经”的权威。我们知道,《坛经》虽然称作“经”,但在内容上实属于禅宗的“语录”之类。柳田认为,无论是神会的《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》,还是《六祖坛经》,它们都是关于戒坛授戒的说法记

录,这些“坛语”的记录后来演变为《坛经》,于是出现了将祖师的“语录”称为“经”的现象。这一现象的特征,在于“将佛陀与祖师同格”,构成了“禅佛教的特色”。但是,柳田还指出,这种现象并非始于禅宗本身。他认为,从道宣的《关中创立戒坛图经》《祇园图经》可以看到,有关戒坛的规定,“并非单单是著作,而是经典”,因而与戒坛规制的性格应该具有密切关系。这样的观点极富新意,对以后的《坛经》和语录所具有的特性的理解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从《临济录》中发现“自由人”

柳田关于临济和《临济录》的研究,已出版的专著有《临济ノート》(春秋社,1971年),注释和解说类以及现代日语译注类有《训注临济录》(其中堂,1961年)、《临济录》(佛典讲座30,大藏出版社,1986年)、《無の探求 中国禅》(佛教の思想7,与梅原猛合著,角川书店,1969年)、《禅语录》(世界の名著18,中央公论社,1978年)、《临济录》(中央クラシックス,

中央公论社,2004年)等。柳田在一篇关于《临济录》的“解题”中曾叙述他对《临济录》一书的感想说:《临济录》这本书,对于他来说,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座右铭式的书籍,因为有了这本书,他终于渐渐地从战后二十余年的荒凉沙漠中走了过来;“临济是我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”等(《临济录》,佛典讲座30,东京:大藏出版社,1986年,第9页)。临济和《临济录》对于柳田来说,已不仅仅是学术兴趣和宗派信仰层面的问题,而且是他个人人生观的问题了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柳田强调应该把临济义玄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,返回到临济所生活的时代场景中去把握临济的“原思想”。他认为,后世的人们对临济的思想有一种“极端的理想化”或者“神格化”,而他自己的工作便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化了的东西。在柳田看来,从宏观的人文历史视野审视,临济的禅学是无限自由的,有着独自的个性和高度;比起作为临济禅的祖师,不如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为彻底,临济才是最为大声疾呼人的价值的人物。因此,柳田强调指出,阅读《临济录》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,即不能把它作为临济宗的圣典,而是把它看作一位“宗教人的言行录”去阅读。柳田认为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从这本书中“倾听到亲身经历唐末严酷历史的一位自由人的呼喊”。柳田把这种“自由人的呼喊”称为“绝对无条件的人的价值”,而《临济录》就是高扬这种价值的语录;《临济录》之所以被称为“语录之王”,其理由也许就在这里。

关于临济义玄禅学的特色,柳田这样概括说,临济禅的特色,在于它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人的佛教,一个彻头彻尾的赤裸裸的宗教;临济说过“无依道人”、“无位真人”,这就是指的自由人。柳田对《临济录》中的用词出现的频度进行过统计,结果发现“不”“无”“总不”“皆无”这些否定词最多,而“人”是继这些否定词之后使用